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资本主义的幽灵

主编 徐崇温

威廉·基根 著
林德山 译



重庆出版社

资本主义的幽灵

主编 徐崇温

威廉·基根 著
林德山 译

重庆出版社 

THE SPECTRE OF CAPITALISM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
William Keegan
HUTCHINSON

© William Keegan 1992

根据伦敦雷迪厄斯出版公司 1992 年英文本译出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资本主义的幽灵

[英]威廉·基根 著

林德山 译

责任编辑 徐国金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3 千 插页 4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ISBN 7-5366-5164-3/F·201

定价:17.00 元

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 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 崇 温

在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凯旋进军，还是遭遇挫折，都在相当程度上同是否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关。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9 页）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列上，社会主义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体现出这种优越性呢？就客观原因来说，这主要是因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就主观原因来说，则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因而体现不出社会

主义的本质,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和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在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认为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帮助下,像俄国这样拥有农村公社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又再三再四地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435页)。

列宁更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看作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当作旧的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开的主张,列宁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2页)他还强调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同上引第171页)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又特别致力于破除那种离开了社会结构的总体状况,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抽象对比的观察方法,坚决实行利用资本主义,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虽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但它毕竟在吸收外国贷款、引进先进技术等许多方面大大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在苏联第一、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大批利用西方技术和设备的大型企业拔地而起,在苏联以16.8%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只是从30年代下半期开始,由于斯大林认为干部、技术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这才开始收缩同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使苏联的对外贸易额从1930年的16.43亿降至1939年的2.7亿卢布,外资企业逐渐被取消,外国技术人员纷纷回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又压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斯大林还在1952年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认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瓦解,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场中,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斯大林文选》下册,第595页)。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苏联更加陷入关门建设的状态。尔后,这种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把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叫做“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正是这种自我封闭状态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大大地拉大了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差距,后来,又成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终于在90年代初期陷于解体的一个经济上的根源。

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新的时代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而要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调整:在生产力方面,它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把高新技术引进生产,使经济获得比较快速的发

展,如果说,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创造了有史以来人类生产力的总和的话,那么,从 20 世纪中期以来,它又创造了超过它自身在以前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它在归资本家私有的企业中推行所有和管理分离以及“雇员持股计划”却又实现有效控股;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它发展形形色色的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在消费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它广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福利国家”,缓解不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在上层建筑方面,它建立系统的国家干预机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内构成一个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调节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爆炸。应当说,在这种种变化的背后,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但面目已非。尽管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种调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进行的,它并没有解决同不断发展的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相反地,这个矛盾还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着;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调整举措,又毕竟缓和了社会矛盾,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继续发展。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就苏维埃政权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资本主义当时的最新成就泰罗制问题指出:“它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操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3 版,第 491—492 页)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的上述一系列新的调整举措也应当这样看,这里面,除了包含有我们需要摒弃的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伎俩和手段之外,又显然包含有我们需要借鉴和吸取的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

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还是世界主题的转变,它们所改变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只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共处和斗争的形式。资本帝国主义始终想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把它们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轨道;过去它主要依靠拿起武器发动侵略战争来达到目的。现在,则主要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的领先地位,控制国际市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接触,把它们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起内应力量,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 1984 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就明确宣告:“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的影响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也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消极因素,尽管同利用外国资本和科技加速发展带来的积极效果相比,毕竟要小得多,但要是不予正视,不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措施而听任其蔓延开来,却会形成严重冲击,遗害无穷,使社会主义变质成为资本主义的。所以,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而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尊感和民族自信心。”(《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143—144 页)而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要求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

正是基于这种为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全面、正确地了解资本主义的需要,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推出这套《当代资本主义研

究丛书》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这套丛书以翻译国外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方方面面的论著为主，在适当时候再推出一些我国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著。我坚信，在知己的同时又知彼，将有助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抓住机遇，又经受考验，从而加快我们的发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译者前言

威廉·基根现为英国《伦敦观察家报》副主编和资深经济学编辑。《资本主义的幽灵》是他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初西方盛行的资本主义“必胜主义”以及东欧的转型而作。当时，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正沉浸于冷战以苏联东欧集团的失败而结束的兴奋之中，新自由主义的卫士甚至宣告了“历史的终结”。而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东欧国家也大都在模仿这种新自由主义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幽灵》便是针对西方以及东欧的这种“资本主义”趋势发出的一个警告。

作者在此用“资本主义的幽灵”作为标题有其特殊的意义。20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是在两种思想和力量的压力下发展的，一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这是由传统的极端自由市场方式所造成的；二是抵制共产主义的“威胁”。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的警告之后，尤其是从苏联作为一支现实的共产主义力量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后，西方资本主义无时不处在一种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之中。但也正是在这两种

内外思想和力量的压力之下,才有了 20 世纪资本主义内在机制的自我更新,有了通过凯恩斯主义方式而对传统资本主义方式的改善,由此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70 年代后,由于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积累缺陷的暴露,以新自由主义所表现的极端自由市场方式重新崛起。尽管它并未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但由于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体制因为自身的无效率而终于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崩溃,这种极端自由主义方式竟被人当作了“历史的终结”方式,它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东欧,在整个世界徘徊。在此,作者是把“资本主义的幽灵”作为一个双关语,用以重新审视西方人视之为当然的“资本主义”,并警告,“如果人们的生活听任自由市场的异想天开,资本主义倒真的是一个危险的幽灵。”(参见本书《结语》)

我们翻译介绍该书,主要是因为作者对“资本主义”的这种重新审视开拓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尤其是作者在以下方面的论述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幽灵”本质,认识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首先,正如作者在原版序言中开宗明义强调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失败决不意味资本主义的成功。作者在概括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演变及其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探讨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崩溃的内在原因,强调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主要是因为它自身的无效率,而并不是因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做得怎么好,更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不存在问题。其次,作者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一种固定的资本主义模式,试图把极端自由市场方式当作一种“历史的终结”方式是一种危险的趋势。尤其是作者对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的分析以及他对“社会资本主义”的肯定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第三,作者通过对苏联东欧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分析以及通过对资本主义(包括标榜自由市场方式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分析,强调传统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并不意味计划本身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失去了意义。相

反，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恰恰是因为在解除过时了的“计划”经济中没有能够充分地运用计划。反过来说，极力标榜并呼吁自由市场方式的美国大资产者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国家的“计划”（公共工程，尤其是国防工程）。第四，作者始终抱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来看待资本主义以及东欧国家的转型。他的分析表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过分迷信于绝对的自由市场方式，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他所发出的从苏联的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的转移道路将是漫长而艰难的警告已经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第五，作者强调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要关注全球问题，要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一直在逐步发展。但这种合作主要是限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而且，即便是在其他一些世界性范围的国际合作方面，西方国家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自由贸易和市场）来要求发展中国家。与这些狭隘的国际合作主义不同，威廉·基根强调，发达国家应该为发展中国家作出更多的努力。“正如早期的资本主义必须适应并对工会主义者作出让步一样，发展一种与发展中世界更为和谐、更具有远见的关系，这将会是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的。这并不仅仅只是针对前共产主义集团来说的。”“努力使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变得更为平等些，这已成为符合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私利了。”（参见本书结语）这些都是十分有远见的见解。

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完全赞同作者的所有观点。作者毕竟是站在资本主义的自我立场来论证这一切的，尤其是从该书的副标题中我们看到，作者明显带有对共产主义的偏见。为真实反映作者的全部思想，我们未对原文作任何删节，相信读者会自我鉴别。

最后，十分感谢威廉·基根先生对本书中文版翻译出版予以的支持，并拨冗为中文版作了新序。

2000年6月10日，北京

中文版序

很荣幸《资本主义的幽灵》要以中文出版。我是在 1990 年和 1991 年间写作此书的，1992 年 8 月完成。我认为，像这样一本书应该真实地反映作者当时的认识，所以，我不打算“更新”原稿，或根据后来所发生的事件修订它。

在执笔写新序言之前重新阅读该书时，我想到了许多事情。写书是一件艰辛的事。我总是告诉那些有志于此的作者，他们应该正确信自己愿意从事一本书的写作；写作的题目必须是他们感兴趣的！这听起来像是明显不过的事情，但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作者从事一项工作只是因为受委派去做，不论他们是否感兴趣于该题目。

从早年开始我自己就对新闻报道和政治问题的写作感兴趣。在我成长起来后，我意识到许多政治问题的讨论涉及到我在英格兰剑桥大学时所主修的课程经济学。我的第一个经济学导师是苏联经济问题专家莫里斯·多布 (Maurice Dobb)。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使我突然意识到，苏联集团的经济问题只是一小部分专家的

事,我们大多数人很少知道俄罗斯和东欧经济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在意识到它的一些局限的同时,我们西方人把所谓的“资本主义”视为了当然之事。

“资本主义的幽灵”这一题目出自一个双关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它(在1848年)来警告“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资本主义的幽灵》中,我试图重新审视我们西方人视之为当然的“资本主义”;但同时也试图解释苏联经济体制错在哪里——在苏联经济体制的可行性方面,西方的“苏联”学者(包括中央情报局)常常误导了我们。

在本书写作之时,西方存在一种必胜主义的气氛。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幽灵》中所发出的从苏联的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的转移道路将是漫长而艰难的警告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于西欧如何从1939~1945年的战争破坏中恢复,有一些经验教训,但令千万人民失望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这些经验教训大多被人们忽视了。

在俄罗斯和它的一些前卫星国家,错误经济政策的社会代价是巨大的。似非而是的是,在解除过时了的“计划”经济中没有能够地运用计划。新的财阀(现在人们所知的“寡头集团”)赚了钱,但主要是通过“交易”,或占有经济领域中更有价值的部类,特别是能源。与19世纪美国的“强盗资本家”不同,他们并不把他们的钱再投回到自己的经济循环中;过多的钱被流进了西方的金融中心。我恐怕,本书中关于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前景的那种明显的悲观主义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本书所讨论的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中,德国模式将这十年剩余的时间用于应付把前东德吸纳进新的统一德国经济中去的巨大历史任务。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曾评论说,这一任务要到2010年才能完成。

曾在20世纪80年代受人尊敬和惧怕的日本经历了一个动荡

的十年和严重的衰退。我在本书结尾时警告说,“不适当的经济政策”可能延长衰退。在经过五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投机性泡沫”中的恢复努力之后,日本终于在1996年出现了经济恢复,在经历四年远低于生产潜力的发展后,1996年的经济增长超过了5%。之后,1997年春,日本政府急剧提高了消费税,打击了他们一直小心重建起来的自信心。这必定是该十年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之一。在我写本序言时(2000年4月),一度受人羡慕的日本经济仍处在萧条之中。

我在本书所指出的“全球化”趋势肯定在90年代余下的时期里继续迅速发展。尽管我并未声称预见到它,可1997年以后的东亚经济危机看来肯定由于我所担心的金融资本流动中的极端自由市场方式而恶化了。“全球化资本”相互作用的加速是如此之快,以致1998年8月俄罗斯拖欠债务在西方引发了严重的(即便是短暂的)金融恐慌。在长期资本管理投资基金(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hedge fund)1998年9月破产后,据一位重要的银行家说,西方金融市场暂时“枯竭”了。

这证实了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最为担忧的事情。但“资本主义制度”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金融危机中学到不少东西;LCTM被拯救了,联邦储备明确表示能够为金融体制提供足够的流动资金以渡过任何新的危机。

在本书所提到的膨胀政策推动下,同时也在与信息技术(美国在该领域中居世界领先地位)相关的商业周期繁荣的刺激下,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看到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繁荣。美国国民收入急剧增长主要集中在占总人口5%的最富有者中间;有大量的工作可为贫穷者提供,但却是以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说是较低的工资提供的。

看来,改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与我写本书时完全同样迫切。美国经济一直充当着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动力”。由此,美国

一直每天要从国际金融市场借一千亿美元来满足它的进口需要。自从1999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的难以控制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以来，那种可能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自由贸易的呼声一直在从美国内部的压力集团中出现。

尽管存在来自美国保护主义集团的反对，克林顿政府努力要把中国带进世界贸易组织。在其小心谨慎地通向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中，中国本身已经显示了它比前苏联更大的智慧。1997年9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香港召开的年会必然要关心亚洲金融危机的话题。但即使像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这位从金融市场赚了大量钱财的亿万富翁慈善家据说也对东亚人的要求表示同情，后者要求对自由资本流动进行控制。

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批评了浮动汇率“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美元和日元的汇率在几年内摆动超过了50%。这样大的摇摆使得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们很难适应。

自我写本书以来，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明确的话，那就是移民问题和控制环境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了。欧佩克一直在提醒我们，不能总是把廉价的能源视为当然之事。

所以，在经过了8年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仍然坚持本书的主要观点，即我们不能让世界经济的发展仅仅听任时髦的自由市场力量的操纵：即使是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看来已取得了对中央计划经济胜利的世界里，仍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公共部门，需要有政府的小心计划和国际合作。

威廉·基根，2000年4月10日，伦敦

序 言

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但资本主义尚未成功。共产主义是一种人为强制的体制,它把有违人类本性的意志强加给了数以亿计的人们。而资本主义则是自然演进的:它与其说是一种体制,不如说是一种可以用许多不同形式来处理政府、工业和商业事务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出乎意料的一件事是,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者感到其道路越来越艰难的同时,共产主义自身陷入了最后困境。1950~1973年期间可谓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至少对世界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们来说是如此,尽管当时的人们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自那之后,接踵而至的石油危机、通货膨胀问题和一种过分的自由市场方式都引起了资本主义状况的恶化,放慢了经济的增长。一代人之前,人们认为文明的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大多数的人类物质需求问题,这些幻想者的希望现已遭受令人沮丧的重挫。值此必胜主义的兴盛之际,资本主义面临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预算赤字的增长是使美国经济软弱无力的原